

【特约来稿】

话语制衡视域下的中美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赵瑞琦

(中国传媒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美国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了海量不实信息,其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企图,有可能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对此,需要通过话语制衡,消解美国对世界舆论的操纵,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具体包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内部话语制衡;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实现外部话语制衡;加强对挑战性言论的抑制,抵消污名化,实现消极话语制衡。

关键词:舆论博弈;话语制衡;认知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9;D822 **文章编号:**1673-5420(2020)03-0015-11

“世纪之疫”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蔓延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一些大国也已成为疫情中心。对此,能否深化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所有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其中,能否以创新型智慧汇聚最大的全球力量应对舆论博弈这个“次生灾害”是形成国际合作的关键。

中国一直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对外援助的实际行动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然而,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节奏不和谐的是,部分美国政客和媒体一直对中国搞污名化、进行诋毁抹黑,试图将疫情政治化、将中国“妖魔化”。为了实事求是、进行正向价值引导,本文将运用话语制衡理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以期应对新冠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及类似全球性公共事件提供参考。

一、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与中国的话语制衡

全球化既导致疫情的全球蔓延,也使引导全球舆论以优化全球抗击疫情合作成了战胜疫情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然而,在既有的“西强中弱”这一不平衡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被动性体现得较为明显。美国发动的舆论战多通过全媒体、全球化的高密度传播,在短时间内迅速产生影响,进而对国际合作形成掣肘。而舆论分歧会将疫情政治化,如果无法通过话语制衡加以反击,那么全球抗击疫情所迫切需要的国际合作就很难实现。

(一)美国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的复杂心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世界既有的运行模式、流通路径和产业链均形成巨大冲击。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与美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疫情的策略,这在全球舆论场引发不同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正常的。

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却无视中国的贡献、罔顾事实,在全球亟需合作抗击疫情的大环境下,不断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屡屡发起舆论攻势。截至2020年4月底,陆续抛出了“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和“口罩外交论”等6大论调。这些无稽之谈暴露出美国想通过将疫情政治化,把本国疫情控制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让中国当“替罪羊”,以此混淆视听。可以说,美国这么做,既是现实压力使然,更是传统思想在作祟。

其一是用谎言来替华盛顿遮掩,用“甩锅”来缓解舆论压力。复盘疫情的发展过程,代表着科学进步和医学创新“灯塔”的美国,由于白宫的错误决定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截至2020年6月30日,确诊病例超过267万、死亡病例超过11万;截至6月20日之前的14周里,总共有超过47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保险。对此,特朗普政府必须做出回应:为什么在事先收到足够预警的情况下,美国还会发生如此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二战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担负起国际领导者的角色,不单是因为其巨大的财富和超强的军力,更是因为其在国内治理、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中有能力、愿意集合并协调国际力量以应对危机。不过,在应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过程中,曾经构成美国领导能力的几个要素,均表现不佳,这使美国国内出现了质疑现行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言论,也给美国精英阶层造成了极大压力。国际层面对美国领导力的质疑更是不绝如缕。

在治理无方的情况下,美国部分政客与媒体试图通过对中国在抗击疫情上的无端指责,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的批评,减轻他们在应对危机上的压力。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担心他在疫情初期的作为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终结其总统生涯。于是,美国

政客通过误导民众,以“甩锅”中国的方式摆脱民众对抗击疫情不力的质问,通过将一切错误归罪于中国,分散民众对美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犯错误的注意力。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推进,中国将成为更加显眼的议题,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中国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将更加政治化。这无疑将导致两国关系在疫情之下会更加复杂,国际舆论场的博弈也将更加激烈。不过,特朗普一旦选择把疫情问题作为选举议题,并与中美贸易挂钩,抗击疫情就会成为次要任务,这无疑是个危险的赌注。

其二是传统的优越感和已有偏见与疫情抗击效果之间的落差。在西方知识精英的认知模式和知识架构中,近代发展落后的非西方社会往往会被以一种“有所欠缺”的语气和“还没有”的修辞来描述。^{[1]2-3}在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下,疫情爆发初期,白种人甚至认为只有黄种人才会感染新冠肺炎。然而,疫情发展与应对却显示出不同的情境:在中国初步遏制病毒的蔓延后,美国和西欧国家接连遭受了大规模疫情爆发的冲击。这使西方某些知识精英对中国“必欲黑之而后快”,以掩盖该国缺乏全球领导能力和国内治理能力的现实。

对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斯托弗·希尔说:“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的美国在应对疫情上如此落后,根源在于美国感染了意识形态病毒,特朗普本人只是这种顽疾的著名携带者之一。”^[2]比“官方放料媒体唱合”的台前戏码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民众认知被虚假宣传带偏。于是,污蔑中国的言行在美国政坛甚至在美国社会成为“政治正确”。当意识形态占据舞台中央位置时,价值观和知识是最先遭回避和被牺牲的。如果美国不能在抗击疫情上秉持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态度,那么抗击疫情所亟需的国际合作将无法达成。

其三是臆测中国的意图,妄图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在初步控制疫情后,中国积极对外援助医疗物资,自2020年3月1日至4月24日,向美国提供各类口罩近35亿只、手套3亿双,以及超过5800台呼吸机。然而,西方舆论总是对中国国力上升、国际影响力扩大抱有警惕乃至敌视的态度,始终秉持典型的“零和游戏”思维。部分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作为第一个遏制住疫情的国家,中国也是掌握着全球急需的防疫物资的国家,新冠疫情会加速中国崛起。英国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也称:毫无疑问,中国决心要创建一个由他领导的新的世界秩序;在我们把政治精力消耗在局部争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正在制定全球计划;当我们尽力摆脱布鲁塞尔控制的时候,却忽略了来自北京的控制不断加强^[3]。

于是,面对中国抗击疫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美国和欧洲精英关于中国崛起和国际影响力上升的讨论再次沉渣泛起,他们试图利用危机孤立中国,通过策动全球地缘政治

纷争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打压中国在既有国际体制中的崛起。

(二) 中国需要话语制衡以赢得“正确与恰当之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国首当其冲。相较于许多西方国家的犹豫不决,中国迅速、高效的动员为全球赢得了重要的缓冲时间,甚至《纽约时报》也发文称,“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白白浪费了”^[4]。与此同时,中国还倾尽所能地帮助其他国家。截至2020年4月底,中国在抗击疫情工作取得成效的同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这些都彰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精神和领导能力。在2020年4月3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被记者问及如何评论“有国家称中国利用疫情提高影响力”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领导权也不是靠吹就能吹出来的,靠争就能争出来的。如果中国的一些有益理念、做法和经验能够为今后的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和治理做出积极贡献,那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5]。

美国利用疫情抹黑中国是有意为之,并非误解或信息匮乏。因此,美国的对华论调虽然无中生有,但并非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清者自清。为此,在避免被不当言论分散注意力,继续展现善意、援助全球的同时,中国应进行强力的话语制衡,不断增强软实力。在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受限的全球信息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软实力上。可信度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如果无法通过话语策略在国际上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形成强大的话语资本,中国就很难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6]。

19世纪外交大师克莱门斯·梅特涅曾说,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正确与错误之争”,而是一场“正确与恰当之争”^[7]。而恰当与否,与人们的认知和判断有很大关系。为此,中国需要通过话语策略建立合法性,以赢得“正确与恰当之争”,从而在国际声誉的博弈中获胜。声誉机制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评估安全威胁的分析工具之一,相比于声誉差的国家或地区复合体,在履行承诺上颇具盛名的国家能够吸引与聚集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8]³⁴。要突破西方主导的全球舆论对中国信誉形成的桎梏,中国需要依靠不断争夺话语权进行国家形象塑造。

同时,打赢全球抗疫战争需要全世界协调作战、统一部署。面对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面对西方的指责和诋毁,为了澄清事实、避免关系恶化、让真正有效的合作变得可能,中国需要对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进行话语制衡^[9]:一是“内部话语制衡”,即中国政府与“朋友圈”内的其他主权国家政府建立应对疫情的话语共识和政策协调机制;二是“外部话语制衡”,即在主权国家之外的国际层面建立合作抗

击疫情的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三是“消极话语制衡”,即在通过话语策略与多数国家达成关于抗击疫情的话语共识的基础上,削弱或阻止美国的舆论挑战。如果可以成功地实施这三种制衡,就可以增强信息密度,使更多的国家和人员认同中国的真实信息;增厚信息强度,使真实信息的可见度和情绪感染力加大;增大信众的数量,使更多的人认同中国立场。如此,中国就有可能打破美国“一言堂”的局面,赢得国际舆论战和世界抗击疫情的胜利。

二、内部话语制衡:加固“朋友圈”

尽管国内经济受疫情影响导致增速减缓,但中国仍应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可信赖的姿态建立形成全球抗疫共识的外交网络和话语同盟。由此,缓解因美国秉持“美国优先”原则而不作为、二十国集团在应对疫情上不够积极等导致的全球经济受冲击及各国对经济前景的忧虑,彰显国际合作的益处,树立中国的道义形象。

一是平衡并优化援助数量与援助效果。中国是医疗设备和诸如口罩、防护服等即弃用品的第一大生产商,这些物资对抗疫来说是必需的。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如与日韩合作应对疫情、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能够为未来的国家间合作打下新基础。在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essential power)”^[10]的过程中,中国可以与各国建立新型的可以合作应对国际挑战的国家间关系。

当然,随着疫情的扩散,相关物品所需数量如天文数字般庞大,中国无法满足所有国家的需要。对此,要注意援助效果,最迫切需要援助的国家,应优先获得防疫物资。在有效遏制疫情最严重国家传染频次的基础上,再进行多边之内的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间的援助。为此,在强调包容性、秉持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建议从“金砖机制”“一带一路”的双边合作开始。

二是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相关性。中国一直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团结协作、共战疫情,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

抗击疫情事关全球的未来发展,中国与各国利益休戚相关。现实世界的合作多是冲突与合作并存,基于集体福利(各议题领域的统合与最大公约数)提升的考虑,在个别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甚至发生冲突,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领域无法合作。为此,中国可以通过首先选择“志同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使“道不同”者也可从其他领域的合作中获益,进而建构利益相关性,减少冲突。

以这样的路径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抗击疫情工作,中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认同,使反对将病毒标签化、抗疫政治化、对特定国家污名化^[11]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三是倡议全球建立科学管控信息的传播机制。虚假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会带来各种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重大伤害。近20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繁荣、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发布虚假信息的平台和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便利。这导致真相与谎言更加难以分辨。在本次新冠病毒流行期间,虚假和错误信息也处于“大流行”状态。

2020年5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指出,新闻工作者是帮助我们做出决定的关键;在世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关头,知情决定着生死大权^[12]。为此,中国应主动出击,倡议和鼓励既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挥其作用,及时厘清错误信息,用科学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和分析来做“解毒剂”,助力疫情控制。

在全球对未来预期不乐观的局面下,中国应该努力建构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找并建立利益互惠的协作关系,通过协调达成合作,达成一种“志同道合”的合作模型,进而引导全球建立共识——当前全球首要任务是对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进行全面协调应对,而非指责和污名化他国。

三、外部话语制衡:达成国际共识

进入信息、物流和人流便捷的全球化时代,主权的传统管理范围开始调整,权力本身也开始多元化和社会化,出现了上移和下移两种倾向:上移至全球公民社会(或称作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网络、跨国市民社会等);下移至次国家组织甚至个人。由此形成了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和全球价值内涵的舆论和决策环境,并制约、改变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模式。这其中,认知共同体是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本文所指的认知共同体是指由科学家、医护人员和医学国际组织等构成的公共卫生共同体,其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13]。

认知共同体的专业化运作有一整套基于内部定义的评价标准的因果认识、有效性判断、共同政策、标准化职责和一系列共同的实践。来自不同学科、拥有不同国籍和背景的专家要建立认知共同体,必须具备如下共同和共通的基础:一是价值基础,即共同的规范和原则,用以指导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行动;二是因果认知,即共同的逻辑起点和后果预判,使共同体成员在分析政策行为和所希望的结果之间存在共识;三是价值标

准,即有效性与合法性理念,这能够大体划定共同体成员的决策与倡议方向;四是路径共识,即决策倡议与实施方案的适切性与恰当性,这能够促使在解决本领域系列问题时做出恰当选择,增进人类共同福祉^[14]。

认知共同体的成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指导社会行为^{[15]22},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内部而言,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可以创造并保持特定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就外部而言,指导性规范(regulative norms)是路线图和指向标(rules of the road),可以指引和限定行为体的行动^[16]。专业化和网络化的科学家认知共同体,以知识层面的“权威角色”和制度层面的“规范角色”发挥着复杂且重要的作用^[17],系统而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政策和国际合作的景观、博弈与结果,是影响治理路径与成效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每一次疫情肆虐都会激起科学家的斗志,促使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寻求疾病的原因、制定应对与预防措施、共享研究成果。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存在,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生命的意义,阐释疾病的文化隐喻,梳理疾病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健康。在抗击大流行病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政策抉择、社会关系、行为规范和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的增殖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和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疾病防治和社会治理的成本。

本次新冠疫情中,在中国实验室于2020年1月份发布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信息之时,全球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就开始加紧寻求解决方案。认知共同体的这种合作关系成功跨越了学科边界和主权国家的限制。

就应对疫情的具体医疗措施而言,通过认知共同体的全球合作,可以建立清晰透明的机制,共享相关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进行最佳医疗实践;联手提高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配效率;协调疫苗和药物研究、测试、生产和分配的资金和临床试验等。其中,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借助视频会议等手段,强调通过开放式科学研究加强信息共享。

就国家抗击疫情的政策选择而言,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会根据科学事实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列出各种可能的选项,供决策者进行决策。这种作用在历史上是一贯的。在面对类似具有科学性、复杂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全球性问题时,作为决策者的政治家群体,往往会先求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们,以获取大量的一手和前沿的知识、信息及对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拥有共同理念的科学家组成的认知共同体能够借助“有用的知识”(usable knowledge)或者“与政策相关的知识”(policy relevant knowledge)形成权威,使国家或社会群体在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对相关观念、标准或制度形成认同,最终在帮助决策者界定议题、厘清利益及选择政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不同控制措施的不同看法及由此导致的舆论紧张,既是利益使然,也是认知上的挑战所致。就新冠疫情的舆论治理而言,认知共同体不仅能够提供科学知识,还能够对舆论塑造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在形成新冠疫情国际舆论的复调乐曲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全球性知识生产与共识塑造,对舆论的形成和引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自然》杂志等权威机构和学术机构都多次强调,疫情的爆发地不等于疫情的源头,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带头炒作的“中国赔偿论”遭到了根本的否定。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表示,现在应关注如何遏制病毒,避免针对地域的污名化语言。美国疫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18]。

因此,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个公共卫生安全威胁时,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与沟通,以融入并影响全球议程的设置,制衡并澄清美国政府基于政治目的所形成的疫情话语。

四、消极话语制衡:回击舆论挑战

在从“单极时刻”到“单极时代”的演进过程中,美国对挑战国的“话语约束”发挥了重要作用^[19]。美国强大的话语霸权甚至发挥着国际秩序“诠释者”的作用,可以根据好恶把他者置于不守规则的负面位置。在特朗普政府锁定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后,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面大于合作面^[20]。在抗击疫情当中,美国也在不断地利用话语霸权的地位来建构(抹黑)中国的形象。

特朗普政府抹黑中国、激发反华情绪,既是为了使美国民众一致对外以转移政府的压力,也是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制造话题。然而,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理性的政治人,他会不断地对利益得失进行权衡,进而改变做法。美国国内的舆论也是多元的,美国国内精英并非完全、一致认可特朗普的做法。随着影星汤姆·汉克斯、NBA 球星、英国首相和查尔斯王子等感染新冠肺炎,西方的精英、贵族对所谓民主体制的效率开始产生失望情绪。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不同国家抗击疫情的不同模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主与非民主的政体二分法,“国家能力”或者说“强政府”是能否有效应对危机的更重要的要素;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1]。

为此,为回应美国的抹黑,中国需要坚决地使用消极制衡策略,守住战略底线,在涉

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毫不含糊,坚决反击美国的谬论,并对自身的主张进行合法化表述,以解构一些国家对美国在疫情上的意识形态认同。在这方面,发布于“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中的《美国悍然发动6大舆论战,直指中国!》一文是个很好的案例。该文通过事例和说理,指出:美国的“中国隐瞒论”实际是“美国掩饰论”;“中国误导论”实际是“特朗普甩锅论”;“中国责任论”实际是“推卸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实际是“自我刨坑论”;“劣品出口论”实际是“挑拨离间论”;“口罩外交论”实际是“中国威胁论”。这样,通过回顾关键节点,就直接驳斥了美国的谬论并告知世界:美国一次次“甩锅”抹黑中国,叫嚣赔偿、追责,事实上是在浪费抗疫时间,是对全球抗疫的破坏。

与此同时,要合理地使用消极话语制衡策略,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全面化,减少经济冲突,化解合作风险。毕竟,言辞、意识形态等因素可能引发误解与冲突,容易激发仇恨情绪、固化并放大敌对关系——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指出,“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22]。为此,在对美进行消极话语制衡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防止出现认知误判,防疫无方并不等于美国已出现衰落迹象;二是要与美国保持人员、信息和民间交往的畅通,有效地管控双边关系,尽量在国际议题上继续进行合作;三是要引导媒体报道和优化官方话语,不断地给世界呈现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公开的中国形象。藉此,促进中美与各国、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达成对疫情的合力抗击,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奠定基础。在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政府若因新冠疫情问题而导致无可挽回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那将必然成为挽救全球经济的障碍。

因此,面对西方精英界认知结构出现分化与疫情大流行加速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降低相叠加的情况,中国对美国的舆论博弈,在坚决反击谬论的同时,要有理有据有节,防止疫情的斗争外溢到整体国家关系层面,尽量不要牵扯贸易之争与崛起之争。

五、总结

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这样一个罕见的、不可预测的,可能产生重大的、全系统的和不可预见后果的事件,如何应对将决定人类的命运。要获致全球合作,作为说服对方改变观念和行为的战略性交流活动,话语策略不是万能灵药。它必定要面对多元国际受众,而基于不同立场和利益,同一话语会在不同受众中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理解。因此,中国与美国要修补可能因疫情而动摇的关系,进行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单靠话语博弈是不够的,这需要最高级别的政治智慧。

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这必然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协调与合

作。中国是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的合作者,无意成为西方强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竞争者。中国将在帮助重建被疫情摧毁的世界经济中担当关键角色。这些都是中美可以进行合作以应对后疫情时代出现问题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2] 美国前助理卿希尔: 美国感染“意识形态病毒”[EB/OL]. [2020-04-02].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402/2406479.shtml>.
- [3] 日本率先与中国“脱钩”, 22 亿美元帮助企业撤离大陆[EB/OL]. [2020-04-10]. <https://news.nestia.com/detail/3903430>.
- [4] 面对疫情, 当摘掉“有色眼镜”[EB/OL]. [2020-03-16].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16/c_1125719709.htm.
- [5] 中国借疫情提高影响力? 外交部: 领导权不是吹出来争出来的[EB/OL]. [2020-04-03].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23829.
- [6] 习近平.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N]. 人民日报, 2020-04-09(1).
- [7] STACIE GODDARD. Uncommon ground: indivisible terri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c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6(1): 35-68.
- [8] ANDREW T GUZMAN.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9] 袁莎. 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J].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9): 85-107.
- [10] 郑永年. 中西“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EB/OL]. [2020-04-14]. <https://www.uzabao.com/mon/keji/20200414/69847.html>.
- [11] 王毅.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 [2020-04-15].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4/15/c_1125858149.htm.
- [12] 联合国秘书长强调记者为新冠大流行错误信息提供了“解毒剂”[EB/OL].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5/1056472>.
- [13] ERNST B, HASS.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14] HAAS, PETER M.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1): 1-35.
- [15] FINNEMORE M.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6] RAYMOND G 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norms[J].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97(2): 205 – 245.
- [17] 赵隆: 北极渔业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 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为例[J]. *太平洋学报*, 2019(11): 39 – 49.
- [18] 美疾控中心主任承认: 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实患新冠肺炎[EB/OL]. [2020 – 03 – 12]. https://world.gmw.cn/2020-03/12/content_33643441.htm.
- [19] 袁莎. 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3): 85 – 107 + 158 – 159.
- [20] 何亚非: 后疫情时代下的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EB/OL]. [2020 – 02 – 20].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3_217853.html.
- [21] 福山: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EB/OL]. [2020 – 04 – 02]. <https://culture.ifeng.com/c/7vL8A0BHg2q>.
- [22]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责任编辑: 张秀宁)

Sino-US public opinion game on the Covid-19 epi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check and balance

ZHAO Ruiqi

(School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spread massive amounts of untru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VID-19 epidemic. Its attempts to politicize the virus and stigmatize China may worsen international opinion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legitimacy and influence of China, it needs to dispel the impact of the U. S. control over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world through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nclude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establishing internal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public health cognitive common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external discourse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suppressing challenging speeches by correcting stigmatization and establishing checks and balances for negative discourses.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game; discourse check and balance; cognitive common community